

山河入梦

140年前,大清一支考察队穿越横断山之行



▲横断山中的梅里雪山。 李建摄

聂作平

大清光绪五年(1879年)早春,位于成都石犀寺的川中最高学府尊经书院,迎来了它的新一任“山长”(即校长),即闻名海内的湘中大儒王闿运。王闿运是应四川总督丁宝桢力邀而来的。晚清封疆大吏中,丁宝桢素以开明干练著称。对于王闿运,他优礼有加,时常坐论国是。一次,王闿运郑重提醒丁宝桢:要防备对西藏觊觎已久的英国人。

王闿运不知道的是,对英国人的企图,丁宝桢早就有所准备。当王闿运溯江而上奔赴川中时,丁宝桢派出的一支小队,正行进于成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。王闿运到书院上任那天,小队已经出发了7个多月,抵达了历来被视作烟瘴之地的云南边陲……

小队的负责人叫黄楸材。论功名,他远逊于丁宝桢;论学术,他难望王闿运之项背。然而,因缘际会,这位生逢板荡的读书人,却以跨越千山万水的矫健之姿,成为当时深具国际眼光的观察者和思想者。他不仅留下了第一部穿越横断山的日记《西轺日记》,还可能是横断山最早的命名者之一。更为重要的是,在他万里壮行的背后,一个大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、拯救和担当跃然纸上。

向西:目标印度

出发那天,恰逢七夕。天气潮湿闷热,气温33.3摄氏度。6个人组成的小队伍从成都南门出发,折向西南。这一天,他们只走了短短40华里,夜宿成都双流县。

小队行进路线,就是多年来形成的自成都通往西藏的官道。人烟稠密的成都平原,苍翠的原野如同一张绿色巨毯,上面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村落和小镇。黄土铺就的官道,仿佛一条细细的丝线,时而穿过河流,时而绕过村镇,时而钻进林子。那些与小队擦肩而过的人不可能想象得到,就是这几个面色平静的旅人,他们竟然要远行万里。在100多年前,这样的行程——尤其是考虑到行程的绝大部分路段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和原始森林——它的危险和带给人的震撼,并不亚于传说中前往印度取经的唐僧所要遭遇的九九八十一难。

小队伍里,除了一名打杂的仆人和一名厨师没留下姓名外,其余4人分别为:章鸿钊、聂振声、裘祖荫和黄楸材。时年36岁的黄楸材,是小队的负责人,他奉了川督丁宝桢之命前往印度,执行一项特殊任务。

仿佛是对黄楸材命运的暗喻,1843年,也就是他出生这一年,中英签订了《五口通商章程》,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出版了《海国图志》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,天朝国门被迫打开,庞大的市场吸引了西方资本,列强纷纷染指中国,大清面临瓜分豆剖的窘境。但是,与此同时,各种和传统中国迥然不同的理念、科学、技术也纷至沓来,为那个时代和时代中的知识分子,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多重选择。黄楸材原本是江西上高县的一个读书人,16岁即中举人,他奉了川督丁宝桢之命前往印度,执行一项特殊任务。

列强之中,英国既率先发动侵华战争,也是对 中国野心最大者之一。长期以来,英国人就对其殖民地印度相邻、地大物博的我国西藏地区垂涎已久,屡屡派员探险,甚至企图以边境冲突进行蚕食。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,导致双方于1877年签订了《烟台条约》,其中一条就是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。

其时,四川总督丁宝桢敏锐地意识到,中英之间很可能在西藏发生严重冲突,而四川向来是西藏的大后方,因此,当务之急是防患于未然,提前做好准备。准备之一就是派人前往印度考察,以便了解英印情况,据此谋划对策。他认为,只有“先将其山川形势之险易,径途道里之曲折以及人民性情之强弱,了然心目”,才能“以后遇事区处较有定见”。

委派人员时,丁宝桢选中了黄楸材。在他眼中,黄楸材“于地图、仪器、算学各项深得泰西秘妙,且耐劳吃苦亦异常人”,是不可多得理想人选。

渴望学以致用并建功立业的黄楸材,接受了丁宝桢下达的任务,从而拉开了万里之行的序幕。

在现代交通工具付诸阙如的晚清,从成都前往印度,有水陆两途。水路即先经岷江、长江抵达上海,再由上海坐轮船到加尔各答;陆路即由成都向西,经康定、巴塘入藏,此后经拉萨、亚东到大吉岭。两相比较,水路的舒适性与安全性能均远胜陆

“

在寒窗下苦读圣贤书的读书人黄楸材,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,毅然奔赴上海学习新学,并听从丁宝桢的指派,为了解英印当局意图的任务,带着6人小队踏上西行的迢迢路途。

1878年至1879年,历时9个月,他由成都向西,经康定,至巴塘折而南下,经中甸、大理、腾冲等地后进入缅甸,再从缅甸坐船前往加尔各答。途中黄楸材写出了《西轺日记》《游历杂言》《西徼水道》和《印度劄记》,并绘制了印度地图、四川至西藏、云南至缅甸路线图,他不仅留下了第一部穿越横断山的日记,还可能是横断山最早的命名者之一,大概也是第一个认识到修筑东南亚铁路有利于中国人

路。然而,黄楸材背负着了解与西藏毗邻地区山川形势的任务,他只能走危机四伏的陆路。

后来,黄楸材抵达川藏交界的陆路,却因西藏民众的疑虑而无法西行,不得不由巴塘折而南下,经中甸、大理、腾冲等地后进入缅甸,再从缅甸坐船前往加尔各答。这样,黄楸材的行踪,先是自东向西跨越了横断山北部,再从横断山北部,顺着横断山的走向南下,穿越了横断山南部,从而在横断山中走出了个反写的“7”字。

大地抬升:从成都到巴塘

窗含西岭千秋雪,寓居成都时,杜甫从他位于西郊的草堂极目远眺,能看到天际线上负雪的苍山,千百年后,如果天气足够好、位置足够高,仍然能看到成都市区眺望到隐约的雪峰。这一线远在100多公里外的雪峰就是著名的四姑娘山,它属于更著名的横断山脉中的邛崃山脉。

关于横断山名字的来源众说纷纭。一种说法是黄楸材前往印度途中,天天面对那些横亘于前的大山,感叹它们仿佛阻断了道路,因而称之为横断山。但翻检他留下的几种著作,我没找到相应出处。另一种说法则认为,横断山概念最早出自于京师大学堂的《中国地理讲义》。这部百年前刊印的地理教材,孔夫子网上有售,价格高达2800元,因而我也没有机会参阅。

不过,不管谁第一个提出横断山之名,横断山脉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地理名词。当然,如果更准确一些的话,横断山脉应该称为横断山系,因为它不是一列山脉,而是多列山脉的总称。至于横断山系的范围,历来也有多种说法,我倾向于中科院成都山地研究所陈富斌先生的定义,即:“横断山系是川西、滇西和藏东一带,岷江和雅鲁藏布江南北向河谷之间,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。自东向西包括邛崃山—大凉山山脉、大雪山脉、沙鲁里山脉、宁静山—云岭山脉,他念他翁山—怒山山脉、伯舒拉岭—高黎贡山脉和色拉拉岭七大山脉。区内有大渡河、雅鲁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和怒江五大河流。这些山川并列组成东西最宽800公里,南北(我国境内)长约1300公里的区域,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。”

离开烟柳繁华的成都3天后,黄楸材一行渐渐走进了横断山余脉。只是,其时的横断山还很低缓。那是邛崃到雅安之间,起伏的山岭上种植着茶树,山原上或是山谷里,分布着大片大片的庄稼地。黄楸材注意到了西方天际隐隐可见的雪山,烈日下四射出逼人的寒光。他知道即将进入山区,却不知道大山将如同一个永不醒来的噩梦,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旅途。

大相岭第一次让黄楸材领教了什么是横断山路难行。1994年秋,我平生第一次远行,其中一段路,是从雅安到康定。早晨出发不久,便进入连绵的大山。山路时而飞旋而上,时而低垂而下。单是翻越这座山,就耗费了两个多小时。当我们从山北经垭口下到山南时,原本雨雾迷茫的阴天变成了艳阳高照的晴天。20多年后,如果经雅西高速从成都前往西昌,必将穿越一个长达11千米的隧道。隧道两端,天气同样迥然不同。这座地理与气候的界山,就是大相岭。

大相岭又称泥巴山,虽然在横断山大家族里,它并不算高,却以险峻著称。黄楸材在日记中说,“鸟道崎岖,乱石狼籍”“万山罗列于足底,危峰耸入于云霄”。其间,一些地方的坡度达到了70度。山路宽不过两尺,一侧危岩高耸,一侧深涧万丈。稍不留神,就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他们只能牵着马,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地通过。到了山顶——我估计,应该就是高速公路修通前国道经过的垭口,海拔不算高,大约3000米——遥看四周,原本青郁的草木消失了,四野空荡,都是灰色的石头。山下还是暑气蒸腾的盛夏,山上居民却身裹皮衣。

横断山北部东区,由于是四川通往西藏和云南的要道,曾经形成过不少聚落。这些聚落,大则

为城,小则为镇。但因政治、军事或经济形势的变化,它们也随之或衰败或废弃。清溪就是最典型的一座。

今天的清溪是群山环绕的一座小镇,街巷依山就势,层层叠叠修筑于大相岭西南麓一块相对平缓的坡地上。镇子里,房屋古旧,人烟稀少。森严的文庙和残存的城墙与城门,却暗示它曾有过辉煌的过往。历史上,由于清溪地处通往西昌等地的牦牛道(南丝路的一段)、通往藏区的沈黎道(茶马古道的一段)和通往嘉定的古盐道交汇处,因此从隋朝开始,就一直作为州县治所,时间长达1300多年。直到1950年,县治才迁往九襄。更重要的是,随着通往藏区和西昌的公路相继贯通,在喧哗与骚动中送走了千载岁月的清溪不得不日趋沉寂,直到荒草铺满古道……

不过,100多年前,黄楸材翻越了高寒的大相岭,下到山谷中的清溪时,清溪虽不算繁华,却还葆有一线生机:“山城如斗,居民无多,四山壁立,双溪倒悬”,让他惊讶的是,清溪城外,居然有数百亩水稻。这些水稻如同房屋一样,一级一级地从谷底向上延伸,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梯田。这些水稻是上苍对山区难得的恩赐,它使当地居民不必像周边邻居那样,必须以玉米为主食。

黄楸材从大相岭垭口下行到清溪之前,经过了一段“迂回百折,陡峻绝伦”的山路后,路过一个叫羊圈门的地方。对此,黄楸材只记下了一个地名。黄楸材不知道的是,这里曾经是一座重兵驻守的关隘。由于大相岭地处夷汉之交,多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从三国时诸葛亮在此驻军,到唐代设置堡垒,再到王建割据蜀中,将唐代的堡垒扩建为关城,民间俗称王建城。后来,驻军撤走,城池废弃,久而久之,就连王建城也讹传为羊圈门。现在的王建城遗址,位于一片荒坡上。风吹云动,草木摇曳,仔细寻找,还能依稀辨识出旧时的台基和城墙。

黄楸材所走的沈黎道上,活跃着大量背夫。对这些生活于底层的民众,黄楸材的日记鲜有记载。此前一年,英国探险家吉尔恰好也有过一次横断山之行,其中,自成都到理塘,两人的路线几乎完全一致。在清溪,吉尔注意到了这些背夫,并用充满同情的笔调写道:“我们不断地与长长的苦力队伍相遇,他们背着茶,神色悲哀,步履整齐地沿着危险的、台阶般的道路上行。看着这些人,我觉得非常悲哀;他们仿佛是身负重物的牲口而不是人,从未不笑,很少说话。”

大渡河畔的泸定是黄楸材进入藏区前的最后一座汉人城镇。如同大多数横断山中的城镇一样,泸定城也沿河而建,几百户人家散漫地分布于两岸的台地上。很多年来,泸定都是一座边城。史载,宋朝初年,宋太祖与吐蕃定界,他手挥玉斧,指着地图上的大渡河说,“自此以西,吾不有也”。

泸定城的地标就是横跨大渡河的铁索桥。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玉树,其流向与横断山脉走向一致,两岸均是高峻的山峰,河流深切,水流汹涌。多年以来,两岸只能在一些地势相对低缓,水流相对平静的地方用小船来往,或是溜索过江。1796年,康熙下旨修建了大渡河第一桥。因大渡河旧名泸水,取边境安定之意,康熙御笔书写了桥名:泸定桥。

踏过晃晃悠悠的泸定桥后第三天,黄楸材走进了一座他称之为“西南之锁钥,藏卫之喉吭”的城市,那就是打箭炉,即今康定。三山环绕的康定,雅拉河与折多河在城边交汇。黄楸材描写道:“二水夹流,三山紧抱,晨夕多风,终年积雪,盛夏犹服重裘”。我犹记得,20余年前第一次到康定,时值十月,站在宾馆的阳台上,迎面便是高高在上的郭达山,山顶雪光明亮,山腰岚岚游荡,寒凉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肃穆。及至爬上跑马山——就是那原因《康定情歌》而世界闻名的山——鸟瞰,小小的康定城沿着折多河走向,怕冷似地蜷缩在河畔,如同彩色斑斓的积木。

康定城西,铁色云低,山路急促抬升,这便是素有康巴第一关之称的折多山。按康巴习惯,折多以东,称为关内,折多以西,称为关外。关内藏汉杂

处,关外纯为藏区。黄楸材注意到,自折多山开始,雪峰总是在道路两旁不时出现,“雪山屹如银屏,夕照掩映,真奇观”。

离开打箭炉20多天,黄楸材翻越了他万里之行中的第一座雪山,那就是沙鲁里山脉的剪刀弯山。如今翻越剪刀弯山,因为隧道贯通,已经不能充分感受到雪山的高峻与险要。在318国道的一处垭口,立着一方石碑,上书:天路十八弯。站在碑前回望,山路曲折折折,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形如剪刀的急弯。将近4000米的海拔,使它成为318线在康巴地区的最高峰。

黄楸材走过的驿路早就渺不可寻。但与318国道相比,那条路必然会因条件所限而更加艰难、危险。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说,为了翻越剪刀弯山,他们一大早就上路了。坡陡路滑,只得牵挽着牦牛行走。到了垭口,“雪子逆飞,寒飈刺骨”,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。这一天,从早到晚,他们行进了90华里。晚上,入住于驻军的棚房。在疲惫不堪地进入睡梦之前,他们还得完成一项必须的工作:测量经度和纬度。由于缺少现代工具,他们只能通过北极星的仰角高度来计算。这天正好是农历十五,一轮清冷的圆月从雪山上升起,月光下是悄无声息的广袤大地。黄楸材和裘祖荫一道,喘息着爬上高高的碉楼,遥望星空,细心测算。

顺着流水,走向南方

在沙鲁里山脉和宁静山脉之间,金沙江浩荡奔流,不舍昼夜。地处川、藏、滇三省区接合部的巴塘,便位于金沙江畔。从县城下行30千米,在一个叫竹巴笼的地方,金沙江大桥成为入藏咽喉。

只是,黄楸材到达巴塘时,金沙江上还没有大桥,他只能坐船或是通过溜索过江。令他意外的是,他的西行之路在巴塘转了个90度的弯,由西进变成南下。

原来,他们的考察行动不为当地人理解,甚至认为别有图谋,因而群起阻止。为了不别生事端,黄楸材决定改变线路,绕过西藏。

这就意味着,他们只能南下云南,从云南经缅甸再由海路至印度。巴塘的地方官员赵光燮告诉黄楸材,前往云南有两条路:第一条是经竹巴笼过河到阿墩子,再经维西抵中甸。这条路比较好走,也是上一年英国人吉尔走过的。赵光燮曾护送过吉尔,路途熟悉。第二条是由巴塘南行,经六玉,奏堆到中甸,路程较近,但所经之地多是荒凉的无人区,必须自带饮食,并且还得防备土匪。

经过与赵光燮等人商量,黄楸材决定走第二条路。一则路程短,省时;二则不必进入西藏,可以避免可能的纠纷。

黄楸材在巴塘停留了22天。这是一座有300余户人家的小城,天气和暖,土地丰腴,盛产青稞和蔬菜。但是,几年前这里发生过一系列强烈地震,房屋几乎全部倒塌。上一年,吉尔在这里看到:“在这不幸城镇周边几英里,还依稀能见这场骇人灾难的痕迹,山坡断裂撕开,山上滚下的碎石形成斜坡,掩埋毁坏不少古道。”“但目前这座城市是崭新的,房子全是新建的。”

吉尔还注意到,巴塘及大多数藏区,民众贫困不堪,寺庙却极为富有。他们拥有大部分河谷平原上的土地,其财富更多的却来自于放高利贷。只有300户人家的巴塘,竟有1300多名喇嘛。

从黄楸材和吉尔留下的文字来看,吉尔的观察和了解更为深刻。这其实也难怪,因为黄楸材的任务在远方,这里只是他的途经之地。当他决定从巴塘折向南方时,意味着路途将比想象的还要艰难。

宁静山—云岭拔地而起,将金沙江和澜沧江分隔于东西两侧,从巴塘到中甸,黄楸材大体

就沿着金沙江的流向,顺着宁静山—云岭东麓而下,经过今天的乡城、得荣和德钦一带——即便在旅游经济兴旺发达的今天,上述地区因风景壮美而闻名天下,其交通仍然相当不便,遑论一个多世纪前的晚清。

黄楸材日记里,时时可见他对行路难的描述:“鸟道崎岖,枯木虬僵,乱石狼籍,兼之冰凌弥漫,滑溜难行”“深林邃谷,冷冽异常”;“攀岩陟磴,无异猿猴”“茫茫无尽的大山中渺无人迹,他们时而向上攀援,时而向下缓行。除了路途艰险外,还有更多困难让他们痛苦不堪:一是高原反应,“头痛目眩,气息喘息”;二是沿途大多数地方荒无人烟,只能支着帐篷露宿。晚上,寒凉透骨,众人冷得睡不着,只好围着火堆打盹;三是这些地区已属“生番”,不要说不知朝廷,就连土司也无力管理,因而匪盗横行。幸赖巴塘土司派出一支队伍护送,否则,以黄楸材区区6人,早就横死山中了。

从巴塘县城到中甸(今香格里拉),公路约360千米,开车约十个小时,黄楸材一行晓行夜宿,历时达18天之久。

在中甸休整5天后,黄楸材继续南行,并于腊月二十六——到处都能感受到春节将至的喜庆气氛——到达剑川。之前几天,经过一个叫冷渡江的村庄时,他业已看惯雪山林莽的双眼,终于看到一片流水环绕的山间坝子。那里,房屋连绵,阡陌纵横,颇像他的故乡江南。尤其让这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感慨万千的是,在那里,他看到了迎春怒放的梅花。一种淡淡的喜悦涌上心头,“如良朋胜友,邂逅天涯”。

在剑川草草过完春节,大年初二,黄楸材又迫不及待地上路了。

剑川可大理一带,地势平坦,属于云南这个山地省份不可多得的精神细作农业区。大理历来是滇西最重要城市,“商贾辐辏,阡陌稠密”“衣冠文物,为滇省之冠”。然而,不幸的是,这座城市刚遭受了长达120多年的杜文秀之乱,以至“灰烬之余,十只一二而已”。吉尔对这一劫难记录了更多的细节:“我们从东门进入,城市内部比四周村庄更加荒凉可悲。街道宽敞,但大半毁损,处处显现出贫穷”。

从大理开始,南行又转为西行。黄楸材也就由顺着江水的流向,变成了横渡江河,横跨大山。他将次第翻越云岭、怒山、高黎贡山,渡过澜沧江、怒江、大盈江,一直西行到帝国极边。

南北走向的高大山脉,固然是阻止东西交流的巨大屏障,而流淌其间的大江大河,更让这种屏障变得本加厉。在澜沧江和怒江上,分布着一些极为重要的桥梁,这些桥梁,在和平年代,是商贾行人的必经之地;在战争年代,则成为控扼一方的天险。霁虹桥和潞江桥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座。

余生也晚,十多年前,当我来到位于保山与永平交界处的潞江坝边时,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铁索桥的霁虹桥已在上世纪80年代被大水冲毁。惟有桥头石壁上,还残留着一些岁月沧桑的摩崖石刻。

早在汉朝,霁虹桥所在地就是南丝路上的要津,称为兰津古渡,当时流传着“汉德广,开不突;渡博南,越兰津”的民谣。那时,来往所恃,乃是船只或藤桥。到了元朝,一座木桥如虹横跨,得名霁虹桥。明朝成化年间,木桥改为铁索桥。到两百多年后的康熙时期,又加以重修。

与此前经过的泸定桥相比,黄楸材发现,霁虹桥更为平稳。这座桥长75步,两边有高大的石基,16根铁索上,铺着平整的木板。两岸壁立千仞,一条小路从桥的两端斗折蛇行,钻入林莽。距黄楸材20多年后,英国人戴维斯也走过这条古道,并留下详细记载,他说:“路石大小、形状不一,空隙很多,似乎使行走和骑马都特别难,尖石伤脚,而在平滑的石头上马很容易摔跤。更糟的是来了一两场阵雨,这使骡子都很难站稳。”

如同澜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一样,怒江亦如是。潞江坝便源于怒江的别称潞江。

与高黎贡山并行的怒江在云南西北部形成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大峡谷,当它咆哮着流入保山境内时,峡谷结束了,一片低海拔的台地成为理想的人居之地,这就是潞江坝。潞江桥就修建在潞江坝上,和霁虹桥一样,均为南丝路上的重要节点。(下转11版)

